

# 上编 日本经济论



## 日本经济研究工作的回顾<sup>①</sup>

### ——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日本经济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是 1964 年成立的，从此，新中国在大陆开始了对日本经济的正规研究工作。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我先后参加出版的著作有：《1973～1975 年日本经济危机及其特征》、《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日本垄断资本》、《日本经营管理体制概况》、《战后日本财政》、《战后日本税制》、《战后日本物价史》、《1973～1989 年日本经济发展史》、《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史纲》。现正在研究的课题有：《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已出版的译书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企业集团》、《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4 卷。

当时领导上给我们研究所的任务是：一、出成果；二、出人才。所以，每有任务或申请课题，总是由我带领青年人组成一个梯队来完成。

在长期日本经济研究工作中，体会最深的有两点：一、选题应紧密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其针对性愈强，论文的深度也愈强；二、要研究经济规律，在讨论政策的优劣时，应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片”为编写建国 50 年的总结，约请院外少数学者写研究回忆录，我有幸被约以学者身份参与其事，按照规定篇幅写了这篇短文，已被采用，并转呈中央宣传部。

历史条件寻找其规律性趋势，论证最好要有计量根据。

以下试举二例。

## 一、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翻译和研究

### （一）

70年代末由我和郭士信合作翻译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书，译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们又先后写出了《日本“倍增计划”的编制方法和可借鉴的主要经验》、《“倍增计划”与日本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倍增计划时期日本就业结构的变化》、《从倍增计划看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几个问题》、《从日本“倍增”计划实现的条件看我国经济翻两番的途径》等论文，论述了该计划形成的背景、重点和比例关系。当时马洪同志极关心这项工作的进程，看到译书后，即嘱我们速呈送中央书记处和小平同志，从而为我国制订20年翻两番规划提供了参考。

### （二）

这个《倍增计划》是日本政府于1960年制成的。计划所包括的时间是1961~1970年度。据日本政府宣称：“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业。”而其最打动人心的口号则是：“10年后按我国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为20.8万日元，约达到现在水平的2倍。”

该计划在当时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和激励，有些人士说：“每月收入将要增加一倍啊！”“那将要成为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啊！”在日本影片《金环蚀》中，有一个人物曾这样说过：“托‘倍增计划’的福，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可见“倍增计划”对日本人民影响之大。日本经过了10年的努力，这个计划所列的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如国民经济年增长

率，原计划指标为 7.2%，实际完成 10.9%。看来，一个能鼓舞人心而又不脱离实际的计划，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会起到激励作用的。

该计划提出当时要解决的经济任务主要有三：（1）充实社会资本；（2）培训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事业；（3）充实社会保障与提高社会福利。

还应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在《倍增计划》中始终非常强调社会资本投资（即公共事业投资）的重要性。在第二编第二章中指出：“社会资本形成是形成生产活动与国民生活的基础，这一薄弱环节早已成为问题……我们痛感在目前情况下，必须从根本上对公共投资的量与质这两方面加以研究，以便今后更加有效地步入充实社会资本的轨道……只有作种种努力扩充构成产业基础的社会资本，才能实现计划所提出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目标，这是基本课题。”

对基础设施（即日本所指的社会资本）的投资，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有：（1）既可增加现实购买力并带来投资的乘数效果，同时又为新的生产扩大增强了基础；（2）可刺激新的购买力，如卫星电视站的建立就可增加对电视机及其他相关电信产品的销路；（3）可增加级差地租的收入，如对铁路、道路、航运、桥梁等的开发，可以提高国土的量和质的利用，增加沿途人民的收益，为旅游矿藏资源等的开发，带来振兴的机会。

由此可见，日本倍增计划时期，社会资本有了大幅增长，也恰在这个时期，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 二、对战后日本物价史的研究

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位经济学者曾说过，体制改革一进

入价格改革，就像航海者进入百慕大。言下之意是，价格改革是转轨国家最艰难的任务。

当时我国正处在价格改革的前夕，我们企图分析战后日本从统制价格到市场价格过渡的规律性。80年代末，我们研究出版了《战后日本物价史》。<sup>①</sup>战后日本经历了初期的平抑恶性通货膨胀的斗争，经历了从统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平稳过渡，1983年后出现了世界最低的通胀率，使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这其中有许多经济规律可循，值得世人借鉴。

#### （一）如何平抑恶性通货膨胀。

（1）同是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如是为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则对通货膨胀无疑会起助燃作用；倘货币的增发是为了增加生产贷款，在企业经营具有效益的前提下，则在一定时期后可以降低通胀率。归根结底，增加总供给是制止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如日本实施1947年7月价格体系时，贷款是来自“复兴金融库”的债券发行，当时日本舆论界有人担心，一年中增加贷款8倍，会引起更严重的通胀。而当时藏相石桥则回答，这种货币增发是为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提供的资金，与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有根本区别。石桥说：“今日，我国有失业者存在，有闲着的生产要素存在。财政的第一要义，是要动员生产要素的结合，为此目的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与货币增发，是一种健全的财政。”

（2）在公定价格与黑市价格并存的条件下，假定货币发行量不变，公定价格的提高可以吸收较多的市场游资，以减少货币购买力对市场的压力，从而减轻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同时，

参加此项工作的，除主编孙执中，还有郭士信、江端平、裴桂芬、陈虹、孙北一。

公定价格在提高后，可用补助金改善生产条件，使公定价格更加接近价值或生产价格，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公定价格的变动应有计量依据。一般说来，公定价格以定在黑市或自由市场价格的 80% 左右为宜。因为，从理论上讲，公定价格的最高限不得超过黑市价格最高限，过低又起不到抑制黑市物价的作用。

（二）从统制价格到市场价格过渡的经济规律性。

在 1949 年 ~ 1952 年间，日本经济经历了从统制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据日本物价厅的总结，具备下列八条基准，可以考虑废除统制价格。

- （1）供求状态已趋缓和的商品；
- （2）黑市价格低于或接近公定价格的商品；
- （3）商品滞销库增加的倾向无法改善的商品；
- （4）公定价格已丧失调节供需机能的商品；
- （5）对生活费、企事业费、出口换汇率所占比重较小，或其波及影响较小的商品；
- （6）废止公定价格能提高质量的商品；
- （7）继续实行统制价格实际收益不大的商品；
- （8）废止公定价格对出口起到促进作用的商品。

上述八条中重要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只有当自由市场价格与公定价格趋于接近时，价格转轨才从根本上具备了条件。因为它反映了两点重要的要求：一是表明供需已趋于平衡；另一个是表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已有提高，单位产品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减少，使商品的价格相应地降低，从而导致两种价格有接近的可能。

从以上可见，价格体制的转轨不能一刀切。

（三）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降低能源、原料的消耗，导

致低通胀、高附加价值率的出现，从而形成物价下降的趋势，它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是什么“通货紧缩”的问题。

据估计，目前每一单位的工业产品所需工业原料量至多只有 1900 年的  $\frac{2}{5}$ 。新材料如精密陶器等具有重量轻、牢度大的特点，正在逐步取代飞机、汽车和建设业中使用的金属。据联合国科技发展中心的报告指出，1990 年汽车的平均重量比 1980 年减轻 26%。50 磅到 100 磅玻璃电缆所传递的电话信息和一吨铜所传递的信息一样多，而生产 100 磅玻璃纤维所需能源仅及生产一吨铜线所耗能源的 5%。

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一块半导体微芯片所使用的原料只占生产成本的 1% 至 3%。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所受打击最为沉重，物价出现了狂乱上涨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重化学工业比重高，能源耗量比重大。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大力从节约能源入手，将产业发展重点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于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即 1983 年开始，日本的通胀率从高于美欧转向低于美欧。

一个国家的通胀率愈低，其国际竞争力就愈强。也正是从 1983 年起，日本外贸年年出现巨额黑字，到 80 年代后半期使日本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就启示我们：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等知识经济的产业，它一方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价，另一方面又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可见，在低通胀率的条件下是可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且已为此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所证实。

# 第一部分

##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编制方法和可供借鉴的主要经验

#### 一、计划的制定过程与参加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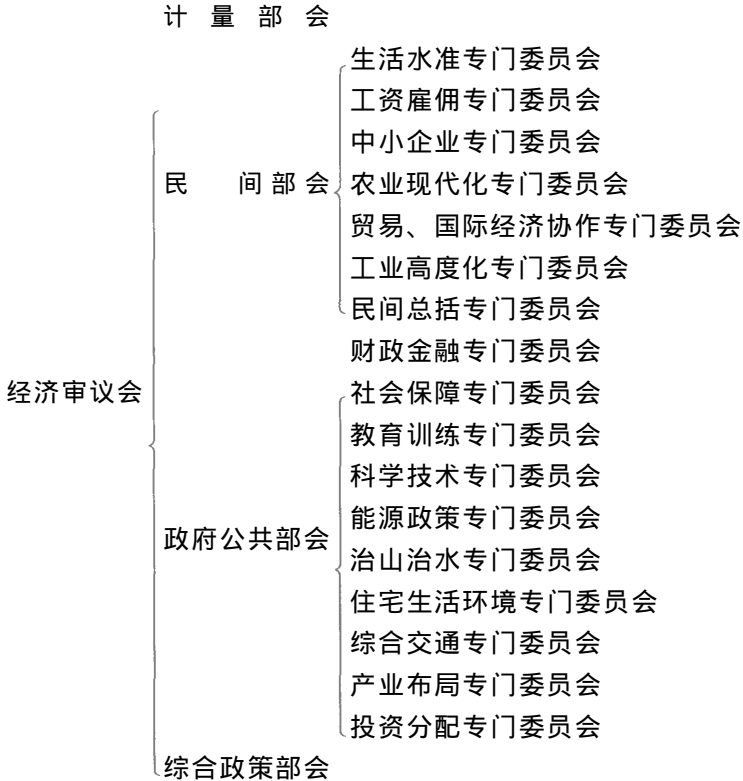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共制定了九个长期经济计划，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 以下简称《倍增计划》）。

日本的长期经济计划，是由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主持制定的，最后由内阁会议决定。

经济审议会是经济企划厅的附属机构。平时，由 30 名以内的委员组成（任期二年），包括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工会、新闻界等人士，最近还增加了消费者的代表。到了制定计划时，还要任命很多临时委员、专门委员；设立各种部会、分科会、委员会等。计划不同，各种分支机构也不尽相同，机

构设置十分灵活。

为制定此计划，1960 年经济审议会所设立的机构如下：



在上述各部会中，共有 239 名有学识经验人士参加工作。

其中，著名的学者教授有：大来佐武郎（现任外相、制定该计划的中心人物，当时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中山伊智郎、高桥龟吉、稻叶秀三、佐藤弘、安芸胶一、伊大知良

太郎、藤林敬三、松井达夫等人。

产业界金融界参加制定计划的，几乎包括了各垄断财团的代表人物。如：植村甲午郎（经团联副会长）、高垣胜次郎（三菱商事经理）、小菅宁一郎（伊藤忠商事经理）、市川忍（丸红公司经理）、永野重雄（富士钢铁公司经理）、土井正沉（住友化学工业公司经理）、太田垣士郎（关西电力公司董事长）、和田完二（丸善石油公司经理）、荷见安（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会长）、村赖直养（中小企业安定审议会会长）、太田利三郎（日本开发银行总裁）、谷口孟（日本银行副总裁）、古泽润一（日本进出口银行总裁）、凑守笃（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堀江薰雄（东京银行首脑）。

新闻界参加的人士有：福良俊之（东京新闻）、土屋清（朝日新闻）、上子俊秋（读卖新闻）、山本正雄（每日新闻）、元城寺次郎（日本经济新闻）等人。

此外，政府各部门均派有代表参加各部会（民间部会除外），作为专门委员。其中：总理府 1 人、外务省 2 人、大藏省 6 人、文部省 4 人、厚生省 5 人、农林省 5 人、通产省 8 人、运输省 7 人、邮政省 1 人、劳动省 3 人、建设省 5 人、自治省 2 人、防卫厅 1 人、科学技术厅 4 人、经济企划厅 5 人。

在综合部会中，各省还派有 1 名 ~ 2 名参事或课长充当干事。

日本制定长期经济计划的过程大致如下：先由内阁总理大臣向经济审议会提出制定计划的要求，后者根据这一要求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审议，制成计划原案。这一过程是在经济企划厅的密切协助下进行的，主要事务机构是经济企划厅的综合计划局。各省都派一人组成联络性会议，对计划发表意见。综合计划局则负责整理这些意见，调整各省间的平衡关系。只要某

一个省的大臣不同意该计划，则该计划就不能成立。

当计划原案制定完成之后，便由经济审议会会长回答内阁总理大臣代表政府提出的咨询。然后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通过，形成正式计划，予以公布。在内阁讨论时，一般均无多大改动，有时也作些文字上的修改。

正式计划制定完成之后，经济审议会经常监督执行情况，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提出建议修改计划。当各方面条件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不管原计划是否到期，则着手制定新计划，这种情况在新旧内阁交替时，尤为显著。日本的实际情况是“一届内阁一个计划”（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语）。如《倍增计划》原订期限为十年，但在执行三四年后，计划中的很多指标就基本上实现了，而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与问题。佐藤内阁上台后，就制定了《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度）。

## 二、计划的性质和作用

据日本官方宣称，该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其中最打动人心的口号则是“10年后我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为20.8万日元，约达现在两倍的水平。”

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计划所揭载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如：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7.2%，实际完成情况为10.9%，工矿业生产年增长率原计划指标10.5%，实际完成情况为13.8%。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发生作

用，因此，它是不可能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的。以日本的情况而论，它的计划的指令性，主要是公共事业部门的投资方面，对占统治地位的私人经济是没有指令性的。《倍增计划》的作者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计划是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下产生的，它不掲載出所有经济领域里的详细计划目标，因而并不强制执行。”因此，这个计划和其他几个计划一样，对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只是实施趋向性的“诱导政策”。如进出口补贴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方面的利息率政策……等等，使其向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计划的重点是放在政府投资和行政开支的分配上。“《倍增计划》的对象中心放在拥有直接实现政策的政府公共部门。”计划认为，在此时期内日本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保证充实社会资本，普及教育，提高社会福利……等等”。日本官方人士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验，主要就是上述三条。

其中第二条是普及教育，即劳动力质的提高。第一条与第三条集中起来是，增加政府开支，用以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与提高社会福利。这两方面合起来的政府购买力，在 60 年代约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左右。

### 三、值得借鉴之处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时期，突出地表现在 1960 年以后，特别是 1960 年 ~ 1973 年间。日本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恰恰是在这一时期。

1960 年日本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和我国 1977 年相比情况如下——

	钢 (万吨)	电力 (亿度)	机床 (万台)	汽车 (万辆)	合成纤维 (万吨)	水泥 (万吨)
中国 1977 年产量	2374	2234	19.90	12.54	18.98	5565
日本 1960 年产量	2213	1012	8.14	47.37	11.82	2253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1977 年我国的钢产量和日本 1960 年的产量很相近，其余除汽车外，都远远超过日本 1960 年的产量。

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日本，是有所不同的。就有利条件看：(1) 我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2) 有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3) 人口众多，不会出现劳动力的缺乏问题。也有不利条件：(1) 我国技术力量和某些生产设备不如当时的日本；(2) 企业管理水平，在组织社会大生产的协作与分工方面，在加强产销联系方面，不如当时的日本；(3) 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平均熟练程度不如当时的日本；(4) 由于人口多，消费量也大，因而积累额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从总的绝对量来看，日本 1960 年的工业水平和我国当前在某些方面，如上表所示，颇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在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所制定的《倍增计划》，在下述几方面我们认为是一定有参考价值的。

### 1. 在经济高速发展与工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 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作用与发展

关于大中小企业的关系问题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在“经济合理性”的原则下，不使大企业简单地吞并或排挤中小企业，而是作为大企业的“卫星工厂”、“共存工厂”，实质上是把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纳入到大垄断组织的“系列”

中。实现这一方针，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支援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其一，大企业提供设备，派技术人员甚至管理人员，以提高其技术与管理水平；其二，政府“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民间放款及财政贷款”。

《倍增计划》要求：“在计划期间要确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体制。”“确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紧密协调的体制。”提倡在大企业周围组织一系列的中小企业为它服务，作为它的零件产品的承包企业，这叫做“系列化”。松下、日立、东芝等公司都是大公司，但他们很多产品的零部件约 70% 都是中小企业制造的。

日本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大中小企业之间应遵守下列分工原则：一般说来，大企业从事原材料的生产，中小企业吸收大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满足国民最终消费需要。

日本大中小企业的协作关系是通过经济合同固定的，各协作厂独立核算。中小企业可以为一个大公司服务，也可以在市场竞争法则下，为其他大公司服务。总之，大厂不搞大而全，小厂也不搞小而全，加强专业化，加强分工协作，这样做既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要，也有利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当然，那些被认为没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则被淘汰。不符合大垄断企业要求的中小企业就更难以存在下去了。

## 2. 农业现代化的次序问题

日本农业的增产措施与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是：先水利化、化肥化，尔后才是逐渐推进机械化。

日本农田水利化进展很早，早已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

一。再从化肥化来看，1960年~1970年间，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平均为100公斤左右，10年增加很少，因为农田所需化肥早已得到充分供应。而农业机械化则进行得很晚。首先从农林业中的就业人数看，自明治以来，一直稳定在大约1600万人左右的水平上，1958年仍有1500万人。但是从1960年~1970年的10年间，却减少了409万人。再从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来看，60年代以前是很低的，而到1971年时，各种农业机械都已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可以说日本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其需要从农业中腾出劳动力以补充工业的需要时，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比美国等国家约晚了半个世纪。一般说来，农业机械化的效用，主要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水利化、化肥化等则可以提高产量。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顺序对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和日本同样存在地少人多的情况；应首先解决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问题。至于机械化问题，可以逐步推行，因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目前从农业中腾出劳动力的问题并不迫切；并且在一定时期内，物力和财力总是有限的，在幅员辽阔的我国，农业机械化所引起的对钢铁、石油等的消耗量，为数相当可观。

### 3. 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培养人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引进

### 4. 重视对外贸易，特别重视出口问题

《倍增计划》要求在不同的国际市场的需要下，应该生产供出口的“王牌”商品。还要求“出口结构应建立在结构的高度加工的产业上”。这是日本出口贸易的一条重要经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贸易加工型”。在劳动力丰

富的我国，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出口方面，也应重视加工贸易。

5. 把国民经济的活动和计划，紧紧地和人们的物质福利拴在一起

有如前述，《倍增计划》最吸引人的口号，也是有别于其他计划获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提出了“把全体国民的收入提高一倍”。

该计划有专门一篇，描写“国民生活前景”，展望“消费水平的上升与高级化”，对未来各项生活的提高，作了具体的说明。这些目标在当时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震动。这样做加强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使人人都感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计划的实施是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从而关心它，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倍增计划》受到了日本群众的普遍重视。它对于动员日本国民的劳动热情，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载《世界经济调研》第4期，1980年1月28日